

用十六年的精彩经历，讲述一个中国人在海外的打拼史

我的十六年 海外生涯

[1988—2003]

马夫哥
——著——

我的十六年海外生涯

(本书根据马夫哥 16 年海外生涯改编)

◎ 同心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我的十六年海外生涯 / 马夫哥著. — 北京 : 同心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5477-0523-0

I. ①我… II. ①马…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87366 号

我的十六年海外生涯

出 版 同心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单三条 8-16 号东方广场东配楼四层
邮 编 100005
发 行 (0769) 23058812
总 编 室 (010) 65252135-8043
网 址 www.bjd.com.cn/txcbs/
印 刷 东莞市信誉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6
字 数 150 千字
定 价 32.80 元

同心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自序 / 1

Part 1 北外的学子，海外的游子 / 3

Part 2 横跨欧亚大陆，首站莫斯科 / 19

Part 3 圣诞夜里的殴打 / 31

Part 4 偷渡，一段危险的旅程 / 55

Part 5 穷学生的国际打工史 / 83

Part 6 遭遇光头党，砍刀与肉搏 / 101

Part 7 露琪亚，从相识到分手 / 113

Part 8 佐礼，枪顶在脑袋上的威胁 / 139

Part 9 雪夜里的狩猎硬汉 / 149

Part 10 四虎市场与八区警察局 / 179

Part 11 穿过黎明前的黑暗 / 195

Part 12 赚钱机器的生活 / 215

Part 13 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 229

Part 14 我是老大 / 239

Part 15 再见，我的海外江湖 / 249

自序

每个人从出生的那一天起，就开始朝着一个方向，坐上了一辆不可以回头的单程的人生列车。回顾我这四十年人生，其实最有味道的岁月，还是 1988 年到 2003 年，在海外漂泊的这十六年。

十六年说长不长，对于日月寰宇，这只不过是弹指一挥间罢了，可是对于我们渺小的人类，人生又能有几个十六年呢？

十六年中，我失去了太多，与此同时也得到了太多。遇见太多的人，经历太多的事儿，走过太多的路，挣过太多的钱，也流了太多的血。有过太多次一个人向这个世界孤独的呐喊与吼叫，但是却没有向这个世界低头和流泪。

风风雨雨、几度春秋，起伏跌宕、悲欢离合，百变人生、酒笑谈歌，一切一切的辛酸，我现在已经可以很轻松地在一杯酒，或一斗烟的时间里悄然释怀。

其实在这十六年海外生涯里，很多故事是在不经意之间发生的，可是

回过头仔细品味，里面值得感悟的人生道理还真的不少。

后来我才渐渐明白，人生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只是你不敢去尝试那眼前的“可能”。因缘与经手我此书稿的出版单位的两位编辑相识，在几次深度的谈话中，我给他们讲述了我在异国他乡的那些往事。

于我而言，那只是一堆陈年旧事，不值一提。可是出版社的编辑却觉得这些故事，十分精彩。遂在编辑的鼓励下，我决定写下这本书，记录这些年的故事。通过这本书，我亦想在时光的筛子里将往昔沉淀下来。

我总对我身边的人说道：“我不是个天生的强者，但我不得不强。”这就是我想写这本书告诉大家的一个道理。

暂不论这本书里的故事有多么的精彩，我更多想呈现和表达的是这种真实的生活所赋予我的奋斗精神，这是一个角斗士的血淋淋的拼搏，一个男人的成长史，一头孤狼的流浪手记。

其实我与你们一样，只是一个一直在拼命寻找幸福的普通人。在此仅以这本书，我的这些故事，送给那些在面对人生的困苦时，不畏艰难的勇敢者们。

Part 1

北外的学子，海外的游子

那个时候北京外国语学院墙外的世界，对我来说是稀奇的、神秘的，瞬息万变的。我每每都爬到墙上，双手弯曲放置双目之上，遮挡住刺眼的阳光，试图看到更远处的景色，那对我来说是一个新世界，或者说是一个早晚要去征服的战场。

那时候我还不到十岁，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回忆往昔，我知道我做到了，我去到了那个少年时眺望和期盼的世界。但我没想到竟然那么远，竟然是相隔万千公里的东欧。

那确实是一个新世界，也是一个鲜血淋漓的战场，那里现实的压迫和艰辛，远比童年想象的美好要多得多。

我出生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童年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中后期。因为我的父亲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所以我自小是在北外大院里长大的。

出国以前的全部回忆，包括我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都受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文化气息熏陶得很深。我的童年生活，基本上都是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的东西两个大院里度过的。

那个时候北京外国语学院墙外的世界，对我来说是稀奇的、神秘的，瞬息万变的。我每每都爬到墙上，双手弯曲放置双目之上，遮挡住刺眼的阳光，试图看到更远处的景色，那对我来说是一个新世界，或者说是一个早晚要去征服的战场。

那时候我还不到十岁，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回忆往昔，我知道我做到了，我去到了那个少年时眺望和期盼的世界。但我没想到竟然那么远，竟然是相隔万千公里的东欧。

那确实是一个新世界，也是一个鲜血淋漓的战场，那里现实的压迫和艰辛，远比童年想象的美好要多得多。

我的小学就读于北外附小，初中就读于北京万寿寺中学，高中就读于清华园中学。上中学的时候，小时候在北外大院里玩耍的伙伴，很多被分到了一个班。

当时的老师对我们这群孩子又恨又爱，爱的是这帮孩子有礼貌、有教养、不打架、不旷课，大部分都努力学习，成绩很好。恨的是思想过于活跃、前卫，玩世不恭。

甚至有的时候顶撞老师，没等老师批评我们呢，我就先跟老师讲起了大道理，有的时候讲得老师都哑口无言，哭笑不得。

偶尔我们还会对当时的教育体制进行抨击，大谈教学方法不当，公民素养和人权之类的问题，如今想起来，自己都觉得非常的好笑。

就这样带着北外子弟特有的书生酸气、洋气、怯弱、高傲，以及与院外世界的格格不入，甚至是叛逆的性格，逐渐长大了，开始有了自己的思维和思考，开始对外面世界好奇了。

我的父亲应该是一个典型的学院派古董，总是爱绷着脸，天天一副老爷子高高在上的姿态。

不过我的父亲出身并不好，是一个真正的农村孩子，在家排行最小，上面还有四五个哥哥姐姐。

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因为突发事件，失去了父亲，也就是我的爷爷，所以我从来没见过爷爷，连张照片都没见过。爷爷去世后，父亲是在我奶奶和其他的几个哥哥姐姐的最大极限的宠爱下长大的。

随着解放的炮声，大伯当上了第一任故宫保卫队的队长，于是大伯一家来到了北京。在很大程度上，是奶奶和二伯父养育了我的父亲，所以父亲对他们的感情是最深的。

父亲是一个有志气的人，从小就任性，还特别的要强。看到家中的贫困和艰难，立志要靠读书改变家里的现状。

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他凭着自己顽强的毅力和坚定的信念，考上了北京外国语学院。高中时代为了听外语，他甚至去做过零工，用做零工挣

来的钱，买了一台矿石收音机去听外语。

我父亲为了省灯油钱，就跑到路灯下学外语，用这种不可思议的精神，完成了自己的学业，成为当年全县仅有的两个考进北京的大学生之一，还居然考上的是北京外国语学院。

而在此之前，他拒绝了去师范学院读书，也拒绝了将来做教师的机会。

那时上师范学院，每个月开十五块钱生活补贴。那个年代十五元对于农村家庭，可是相当大的一笔钱，有一个稳定工作，每月开上十五元工资，生活是美得很的。

家里都劝他去，他就是不去，因为他一直梦想着成为一名优秀的外交官，并能以此光宗耀祖。

但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一场文化大革命，让他在毕业之后没有分到外交部，也没有分到广播电台、总参、国家教委这样有前途的事业单位。

而是被迫留校，做了一个他一辈子最不愿意做的人民教师。

我的母亲生在山东，长在开封，三岁就失去了亲生母亲，后妈的虐待让她过早地离开了自己的家庭，成为一名北京葡萄酒厂的普通工人。

她没有体会过家庭的温暖，没有体会过亲人之间的和睦与恩爱，所以不知道如何做一个体贴的太太和母亲，也不知道如何安排家庭的生活。

那会儿我们家有公粮吃，有配给，还有购物证和粮本，每个月可以买到配给的东西，而农村几乎啥也没有。

所以逢年过节，要么二伯，要么他的孩子，总会骑着自行车，驮上很多白薯、花生之类的土产走几百里地，来到我家，住上几天，我们家也在这期间尽量用家里最好的食物、酒水来招待。

我的二伯有六个孩子，除了一个女儿以外，都是男孩子。他的孩子一个个长大，孩子们长大了，当然要娶媳妇。

娶媳妇要盖房子、要请客的时候，也都会来我们家，我父亲能给二伯的，都会给。包括现金、大米、白面、副食、面票、粮票等。

而家里的东西也常常消失，有时甚至就连碱面儿都会被拿走，而我记得最贵重的东西是一辆永久牌的自行车，在一次老家来人以后再看不到了。

父亲只顾老家不顾现在的家，这行为招致我母亲的反感，毕竟这里有老婆孩子呀！

我作为一个孩子，没觉得有什么不好，但只是自己肚子也是饿着，也会馋好吃的东西。在我父亲的思想里这是孝顺，因为自从我爷爷英年早逝之后，我的伯伯们，就像他的父亲一样，照顾了他很多年，直到把他送入大学。

父亲和母亲两个都是出身卑微的人，在北京外国语学院那样一个充斥着学府酸气的氛围中，其实是压抑的、自卑的。

因为很多老师出身都是知识分子家庭，而像我父亲这种半路出家的知识分子，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地位其实是不高的。

在那个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的年代里，教师是没有社会地位的，当然更没有经济地位，我父母的工资加起来一个月才五六十块钱。加之母亲身体不好，上班的地方又远，劳累且营养不良，总请病假，所以每月拿到手的钱，根本就没多少。

贫穷是可怕的，它可以抹杀很多美好的东西，很多珍贵的东西，甚至能揭开每个人温和表面后的冷漠，这就是生物的本性。

生活的艰难、文化水平的差异、社会地位的低下，导致两个人脾气暴躁，经常发生矛盾和口角，甚至吵架，偶尔还会有肢体碰撞。后来多少次吵着离婚，经同事、领导、亲戚、朋友的多方劝阻和开导，婚姻勉强维持了好多年。

从我记事起，父母几乎没有一天不是在吵闹、抱怨中度过，所以在整个北外大院里的人都知道，北外教师家庭中，我们这个家庭的不和谐是非常有名的。我的家庭完全跟北外大院的氛围是不相当的。

同时在北外大院，那样大吵大闹的家庭只有两家。一个是我们家，一个是我爸爸同事的家。我们家吵架打架的事儿，早已是北外大院所有老师

家庭中饭后的谈资了。一传十，十传百，最后传来传去，传得大家都知道，都了解了，也就不传不说了，也就见怪不怪了。

父母情绪的不稳定，使得我从小到大都是在打骂声中、争吵声中度过的。父母的矛盾、婆媳的矛盾、父亲的压抑、母亲的不平衡，经常会变成怒火，发泄到我的身上。

因此一回忆起我幼年时代的家庭生活，我都会不寒而栗，不敢去想，更不愿意正视和面对。我愿意在北外大院里玩儿到黑夜，但就是不愿意回到那个家吃饭睡觉。

在家中因为挨打被邻居嘲笑，而在幼儿园，贫穷的童年中，我没有新衣服，也因此被小朋友看不起。

由于精神压力很大，我从上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尿床，天天尿床，然后被老师和同学们嘲笑，被父母批评、打骂，进入恶性循环的怪圈。一直到十四岁的时候，我才开始不尿床了，却开始口吃起来。

这个家，我每天进家门的时候都是提心吊胆，不知道今天会有什么厄运落到我头上。所以当我的父亲告知有送我出国的想法的时候，可以离开这个家的时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幸福。

我不知道外边世界有多大，也不知道有多大的风险，只知道只要不迈进这个家门，自己就可以安宁一些。

我喜欢在外面玩儿，喜欢夏令营，我觉得跟一大帮同学在一起疯狂地玩儿、肆无忌惮地开心，这感觉比在家里要好千倍，甚至万倍。

偶尔我的生活也会好一点儿，那就是奶奶在我们家住的时候。我跟着奶奶，她很疼爱我，很呵护我，给我讲故事，把好吃的偷偷留给我，我生病的时候她一边做针线，一边整夜守候我，我挨打的时候她也总是护着。

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对我真正的抚爱、呵护、包容的人就是她，唯一能让我在这个世界时时牵挂的人也只有她。

直到今天为止，我一想起这种温情，还会忍不住热泪盈眶。

而从我父母那里得到的，只有他们不知道因何而起的吵架声，只有不

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暴打我一顿的不安。

我很少感觉到家庭的温暖，也就是这种“没有感觉到”，在我潜意识当中，我对“家”这个概念，已经开始模糊了、失望了。我一直渴望着离开这个家，去逃避这种压力、恐慌，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不是会轻松一些，美好一些。

于是带着这样的梦和好奇，我在高考时多少故意地松懈了自己，就是为了去实现自己的梦。离开这个家，去远方，去大院墙外那个更辽阔、更无际的世界。

我的父亲在匈牙利进修过两年，1984年回到了国内，几年的深入研究和考察后，他对当时的中国教育体制非常的不满，认为欧洲人的教育体制更加人性化，有先进意义。他觉得如果我能早些受到西洋教育，对我的未来是不一样的，是很有好处的。

我1969年出生，1988那年我正好十九岁。在那一年的仲夏，我迎来了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高考。

我的父亲当时总对我讲，如果我不能考上清华北大或者北外之类的名牌大学，他就干脆送我出国接受欧洲教育。其实早在初三的寒假，父亲就开始教我和另外几个学生学习匈牙利语。

对我来讲，出国这样的机会，也很符合我远走高飞的想法，在高中的学习我就怠慢了，能应付考试就行，而把很多精力放在英语和匈牙利语的学习上。我多少有点儿故意放纵自己，为的就是逼迫父亲实现他的承诺，让我到国外留学，放我远走高飞。

高考以我没有收到任何录取通知书的结果结束了，父母还是恼怒。

其原因有两点：第一，这事儿说出去丢人。第二，他们要为此实现送我出国的承诺。

可真的到了放一个小孩子单枪匹马地去闯国外，还是一趟不可想象、前途未卜的冒险。

而我却不以为然，也无暇去想父母的顾虑。这事都提了几年了，我也

花了那么多时间，高中三年，每到暑假，总有那么十天半个月，我父亲要抽出他全部的时间，教我学匈牙利语。而我也做了那么长的梦，最后没结果，坚决不可以。

想到这些，我就必须全力去争取：吵闹，折腾，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北外的孩子在思想上，相对来说非常的活跃，家长对他们的思想限制是很小的，而且经常教育他们要放眼世界，并且都会利用各种机会，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国外去锻炼，但一般都是在大学毕业以后。

而像我这样高中毕业，就直接出国的，在我们那届校友里，还只有我这么一个。跟我同期学匈牙利语的，还有几个父亲朋友的孩子，他们后来也都到国外了，其中两个还去了匈牙利。这是两个女孩儿，叫樊颖和张颖，之后的故事会讲到她俩。

就在这一年的春夏交际的时候，我的父亲在匈牙利工作和进修时，认识了一位老工程师叫“马季”，我喜欢叫他“马季大叔”。

他带着他的女儿女婿到中国来旅游，并住在我们家里。

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见外国人了，也不是我第一次见匈牙利人了。但是他憨态可掬的样子，一个很有欧洲味道的大鼻子和深黄头发，还是深深地勾起了我的好奇心。

马季大叔是父亲在为引进第一套肉鸡加工联合设备而做翻译时认识的。当时马季大叔是匈牙利方一家公司的工程师，曾经去过很多国家，现在已经退休了。

他非常喜欢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很想来中国看看这传说中的国度。这次来华，一是满足了他一个老人家的夙愿，二是顺便让他和我认识一下，看看老头愿不愿接受我，帮助我踏出国门。

马季大叔六十多岁了，灰白的头发，戴一副黑边眼镜，身高足有一米九，进我家门时一定要低着头，宽宽的肩膀，足可以卡在我家的门框上。

每当握手的时候，我惊叹他的手是如此的巨大，小拇指跟我的大拇指一样粗，我的手在他手里简直就像婴儿的手一般。

因为我跟父亲已经学了一段时间匈牙利语，所以就一些简单的问题，我已经能跟马季大叔沟通了。我父亲就有意让我陪着他们，去逛了故宫、长城、颐和园等景点，几乎北京所有的旅游景点都逛遍了。这么一来既让我练习了匈牙利口语，又锻炼了跟外国人的沟通能力，还增进我们的相互了解。

不到三个星期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马季大叔玩儿得很高兴，享尽美食，看尽美景，实现了他一直想游遍北京的夙愿。

临行前，马季大叔表示欢迎我去匈牙利生活并学习，他将尽一切努力帮助我出国，并实现上学的目的。他办完了他该做的事情之后，就回到了匈牙利。

高考之后不久，我收到马季大叔邮寄来的邀请信和往返火车票以及经济担保，这一切就好像为我新的人生的开始买好了第一张船票。

七月参加高考，八月我就开始申请办理护照，九月十月就办好了签证。一切都是我自己办的，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骑着自行车，一次次地奔走于出入境管理局和使馆之间，心中充满激情和喜悦。

我有个习惯，办一件事情，没办成之前，我不爱跟任何人说。办不成会被人嘲笑的，所以直到行程定了之后，我才告诉我们班同学，我要离开了，我要去海外了。

听到这个消息，可想而知，他们是多么的震惊，多么的不舍得。当时班里也有很多女同学喜欢我，有几个女孩子对我恋恋不舍，她们觉得太突然了，劝我可不可以不离开。

高中三年，我做了两年的文科班班长，我领着大家打球、看画展、看电影、爬长城、开运动会，还有气老师、抄作业、上课传纸条……因为家里都是北京邮电学院（1993年改名为北京邮电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还有中科院的知识分子，所以大家不自觉地就凑到了一块儿。

一起笑过、哭过、喜过、忧过，共同分享青春期少年的躁动和好奇。

但出国这事儿，是我准备了几年的事情了，已经是铁板钉钉的，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

所以即便有再多不舍，可我还是要走。我相信天下无不散之宴席，我也相信他朝明日，自有相见之时。

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个不新鲜的词叫“大陆桥联运”，这条联运路线，时至今日早已经很少被人提及了。

这个名为“大陆桥联运”的线路，横跨整个苏联全境，能借此通往所有的华约国家。

去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需要到莫斯科换乘。

那个年代到莫斯科有两条路线，第一条路线是从北京出发，途经二连浩特、乌兰巴托、贝加尔湖、伊尔库斯克、莫斯科，进匈牙利境内。另一条路线是从中国的东北，途经哈尔滨、满洲里、贝加尔湖、伊尔库斯克，进匈牙利境内。

每一条路线，在当时的陆路交通都是漫长，而且是极不顺畅的。但我不去想距离之远，也不想命运的轨迹，或许就此就发生了改变。

对于那时的我而言，我只想一直往前走，我不能往后退，而且我也没有退路。我喜欢这种勇往直前的感觉。

护照签证办好，该决定出行日期了，意味着该签票了。

来到设在国际饭店的签票处，我出示了车票。那是被钉在一起的，两张红色的卡片，用几种文字写着出发地、目的地、有效期、座位的级别等。

负责签字的工作人员，懒散地接过车票，看了看，抬头斜着眼看看我，开口对我说：“小伙子，你这张火车票是在国外买的吧？”

我说：“是的，我父亲的朋友从国外寄来的。”

“你这可是高包呀，你有介绍信吗？”

我惊讶地问：“什么？介绍信？！没听说定位子要介绍信呀。”

“是的，一般票定位子是不需要的。但你这是高包，就是高级包厢，国内只有局级以上的干部或者外国人有权利定这样的座位。你是中国人，要坐这种票，要么拿介绍信来，要么改成普通卧铺。否则，我们不能给您签。”说着，就将票递回给我。

我拿着票，看了看，这才注意到一行英文：“First Class。”（一等舱）装好票，我说：“那我先不定了，我回家问问我父亲去。”转身走出了国际饭店。

回到家，把事情原委告诉了父亲，他也惊讶，说没办法，只好改座位级别了。

过了几天，我再次来到国际饭店，这次那签票的工作人员身边坐了一个岁数大些的人，看模样像个领导。我再一次把票递过去，工作人员显然记得我，直接问：“介绍信呢？”

我说：“没有。”

“那就只能改成普通卧铺了啊？差额不退啊。”

我很不情愿地说：“那好吧！既然这是规定，那就这么办呗。”

他转过头跟那个领导模样的人，简单说了几句，说明情况，领导接过票，仔细看了看，又看了看我，最后翻开一个本子，查阅了一下，跟签票员低声说了几句，我没听清。

最后又对我说道：“不用改了，直接给你签了吧！你得交一百元的手续费。”

我看了看这个领导模样的人，有些发蒙，口齿不清地反问了一句：“您说什么？为什么不用改签呢？”

领导模样的人用温和的声音回答我：“小伙子，在国内，这种票没有介绍信是不可以卖的，因为只有局级以上的干部才有资格坐，还有就是外国人可以买。而且票价也不是这个票价，要贵得多。你这票是国外买的，比我们卖的便宜得多。刚才我看了一下，二十三号这列车上空位子很多，所以给你签了。”

我这才恍然大悟，连声感谢着。

一切前期准备做好了之后，就等着动身的那天，我儿时爬到北外大院墙上，那种对外边世界渴望的、躁动不安的心，又在起伏不停地跳动了起来。

我期盼着早日到海外，离开这个家，但是我没想到的是，无尽无边的